

劉紹唐（1921～2000）

劉紹唐先生，本名宗向，筆名李光裕、吳中佑，原籍河北蘆台，一九二一年農曆九月十四日出生於遼寧錦縣。國立西南聯大、北京大學畢業，歷任記者、編輯、纂修、教授、研究所所長，《傳記文學》創辦人、社長、發行人。二〇〇〇年二月十日因肝腫瘤病逝台北。

《傳記文學》自一九六二年六月創刊



此照片由劉王愛生女士提供

後，成為民國以來最豐富的史學寶庫，海內外學術界尊稱為「民國史長城」。劉氏夫婦獨立支撐卅八年、打破台灣文史雜誌發行紀錄的《傳記文學》，在劉紹唐病逝當年九月號發行「最後一期」後，從十月起隨著經營權的移轉，象徵性的劃上了句點。

劉紹唐幼時因國內戰亂頻仍，四處奔馳，養成他在困苦中堅毅生存的本領，而其幼時即自我培養繪畫與寫作的興趣，不僅為流離生活增添樂趣，也為他爾後創辦雜誌奠定深厚的基礎。一九三一年九月，遭逢九一八事變，東北各省相繼淪陷，劉父率全家隨服務多年的郵局撤退關內，遷居北平，輾轉上海，並在此就讀初中，課餘喜歡畫漫畫，所作獲多家雜誌刊登。

一九三七年夏，日軍發動蘆溝橋事變，劉紹唐在上海考入時遷南京之國立東北中山中學就讀。後因日軍侵擾，戰火南移，學校不得不多次遷徙。校長王先青遂率全校師生先後撤至蕪湖各地，備嘗艱苦。這段流亡求學期間，劉紹唐課餘任學校壁報編輯，兼畫插圖、漫畫，或以各種筆名向《大公報》文藝副刊投稿。

一九四一年夏，劉紹唐考上設於昆明的西南聯大，課餘繼續向文藝刊物投稿，藉稿費貼補生活費。西南聯大係戰時北大、清華、南開三校之合組而成，人才濟濟，盛極一時。抗戰勝利後，三校遷回平津，劉紹唐分發至北大畢業。當時胡適任校長，畢生倡導傳記文學，鼓勵知識份子撰寫自傳及回憶錄；並多次在校中舉行公開講演，闡述傳記文學與歷史、文學、教育之重要。自幼嗜讀民國歷史的劉紹唐深

受其影響，興趣乃由民國歷史轉移於人物傳記。

一九四八年，劉紹唐在北大以半工半讀方式補修學分，並於大學秘書處任兼任職員，同年修完大學學程。一九四九年一月，北平淪共，為求生活，遂參與「南下工作團」。經過一年多時間的煎熬，劉紹唐料到將要發生的事情，他對「革命實際」極其失望之際，決定蓄意求去。歷經一番隱密策劃，終於在一九五〇年夏天，得以輾轉各地，並由廣州搭乘廣九鐵路火車逃離「鐵幕」，安全抵達香港。

劉紹唐求學階段國家遭逢內憂外患，目睹國人在求自由、求生存的意思力。從西南聯大到北京大學，豐富的學習背景，讓他又經歷多年自由主義教育。在共產黨陣營裡，他更見證到革命實踐背後的黑色真諦。這些豐富又深刻的經歷，使得對血淚交織的民國史有著強烈熱愛的劉紹唐，對這個大時代又多了一份責任與使命。

劉紹唐初抵香港時因人地生疏，常日獨居斗室，乃將在共區一年餘所見所聞，陸續寫成六十篇短文，並於當年冬天安抵台灣。一九五一年二月，劉紹唐將前撰短文彙刊為《紅色中國的叛徒》，並於臺北中華日報發表，以報導真實可信，轟動一時，成書後並被譯成十餘種語文，行銷全球。

因此一九六二年二月初，滿懷「為國家寫歷史、為讀者提供真相、為文學塑造風格、為出版樹立楷模」沈重使命的劉紹唐，即以北大學生身分向老校長胡適請教辦傳記文學事宜，胡適心裡深感欣慰，惟

顧及到當時台灣環境，難以長期經營，反勸劉三思而行。

因在戒嚴時期，辦理一份專門討論民國史的雜誌，事實上是既艱難又極危險的賭注。當時民國史斷層主因，除了正逢國難之秋，史料不易整理外，最重要的是強人主政，社會裡存在太多的顧忌，無人敢整理與發表那些隨時可能觸犯忌諱的資料。

劉紹唐深知出版民國史的艱困，隨時遊走法律邊緣，觸及禁忌即有可能遭抄家滅門的命運，但這些橫逆仍未撼動他的初衷，毅然創辦傳記文學。在國防部總政戰部《國魂月刊》擔任三年主編的經驗，早已練就他膽大心細的辦事原則，又對雜誌出版流程瞭若指掌，因而敢放手一搏。為順利出版，他隨時調整經營哲學，使傳記文學得以在不平坦中安全度過卅八年。

由於廣交遊，人緣佳，再經由他的恩師崔書琴教授黨政軍以及中外學術界豐厚人脈，他乃得以經常和這些學界、政壇大老接觸，建立深厚的私誼。由於當時讀書人都善於保護自己，惟恐沾惹虛名，都不太發表自己的問題。為邀各領域，黨派名家手稿，他不惜下海應酬，歷經辛苦，才獲得源源不絕的稿件。

《傳記文學》月刊於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正式創刊後，一時之間造成轟動，並成為文史、黨軍政各界暢談秘辛軼聞發聲的園地。在歷時三十八年出刊四百餘期當中，始終如一，創立了我國期刊史上空前之紀錄。這段期間，劉氏夫婦主持編務，從未假手他人，以「家庭手工業」的方式，令同業難望其項背，且在我國文化

界、學術界、出版界，亦罕有先例。

《傳記文學》創刊，不僅僅是一本雜誌的發行，而且還帶動整個社會重視與研究傳記的風氣，四十年來撰寫回憶錄、傳記者已不可計數；讓眾人在民間野史和官方記載中相互比較與辯證，歷史真偽自然浮現。五〇年代，由大陸撤退來台與定居海外，過去負有國家重任者逐漸老去，劉紹唐為搶救與發掘活史料，及時擬定「口述歷史計畫」，並多次舉辦「人物專題座談會」，若干重要人物史料得賴以保存而不致湮沒。不僅讓傳記文學闖出「民國史寶庫」名號，也讓劉紹唐獲得「野史館館長」雅號。

數十年來，劉紹唐真誠、寬厚的胸懷，使舊雨新知文稿源源不絕，由於門生滿天下，劉師父名聲也就不脛而走，最讓劉紹唐欣慰的是：他的信徒上至權貴下至販夫走卒。《傳記文學》數十年在沒廣告，僅靠讀者卻能維持不輟的經營方式，學術和傳播界均視為奇蹟。正因為他擁有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，才能展現超人的毅力。

卅八的苦心經營歷程，劉紹唐並非諸事順遂，除隨時要提防政治干預和經濟壓力外，最困擾他的就是好不容易培養的人才很快就被挖角。早將傳記文學當成終身事業的劉紹唐，在苦撐其間不只一次抵擋權位、發財等誘惑，也堅持絕不為錢財委曲求全，以維持一份雜誌的尊嚴。

劉紹唐除發行《傳記文學》月刊外，特別編纂：《民國史料叢刊》，《民國大事日誌》及《民國人物小傳》三套系列叢書，為民國歷史提供進一步研究。大陸改

革開放後，一九八四年起除仿辦《傳記文學》月刊外，亦仿照劉氏三套系列叢書體例，編印多種史料書籍，為數可觀。大陸出版事業多係官辦，而劉氏獨撐私修史料事業長達三十八年之久，唐德剛教授遂誇劉氏「以一人而敵一國」。

實際上四十多年來，曾被西方學者稱為文化沙漠的台灣，乃是靠著無數的出版物來美化的。這些刊物有的遭連根拔除，有的功成身退，有的則繼續茁壯。劉紹唐在辦理傳記文學的歷程中，隨時都在調整經營步伐，才得以在強人時代適應環境繼續生存下來。

一九六〇年一月，大陸即開始出版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，自此大陸出版的傳記、自傳、回憶錄文章等書，多如恆河沙數。這批材料卻是十餘年台灣傳記文學的大稿源，而使劉紹唐苦心經營的《傳記文學》幾有「大陸文史資料選輯台灣版」之稱。這種無可奈何之事，更在兩岸開放之後，成為更必然的現象，而《傳記文學》的稿源早象也就不需要憂慮。

《傳記文學》經營多年後，即遍及海內外，劉紹唐並未自滿於如此的成就，對於無人可比的史料，他覺得那只是浩瀚歷史隧道中的一鱗半爪。造成此一遺憾，他認為是國內始終對開放史料仍相當保守所致。他感慨的說：「中國歷史都刻意將偉人塑造成完人，以致民國八十多年來，不知有多少歷史事件說不得，寫不得，碰不得，既沒有人定期公布檔案，許多歷史黑盒子到現在也沒有人敢予開啓。」

與劉家交情甚深的李敖在傳記文學創刊時，應劉紹唐之邀撰寫一篇專題。此

後，居於長年戒嚴的特別環境與種種因素，兩人遂保持「文章不成交情在」的默契。劉紹唐逝世當年九月，也是劉家創辦《傳記文學》的最後一期，李敖因感念舊情與邀稿，特別撰寫特稿，對《傳記文學》發表「一針見血」、論斷功過的評價。並在文中指出，《傳記文學》「功在很技巧的顯出了（還談不到揭發）國民黨的許多糗事；過在挾泥沙俱下，也幫國民黨作了太多不實的宣傳與偽證。」

以「把活人辦死、把死人辦活、把自己辦老」自況的劉紹唐，曾決心在有生之年繼續揭開歷史的黑盒子，以對得起歷史，對得起廣大的讀者。李敖對《傳記文學》的評價，也許是《傳記文學》在歷年來強人體制下的生存之道，也許是劉紹唐與台灣的新史學家長年想克服的一點障礙吧！

為表揚劉紹唐在歷史成就，新聞局金鼎獎特別頒給劉紹唐「特別貢獻獎」，由其夫人劉王愛生代表接受。二〇〇〇年十月，《傳記文學》由世新大學校長成嘉玲姊妹接辦後，其版權頁仍將載明「創辦人劉紹唐」、「榮譽發行人劉王愛生」等字樣，以彰顯這位終其一身奉獻史學的劉紹唐對歷史的關懷與熱沈。對於這位終身倡導傳記文學薪火的野史館館長，台灣的史學家們是不是該為他記述傳奇的一生呢！（陳延宗）